

A Collected Wor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文库

党的理论 80 年历程

总主编 赵云献

主 编 马西林 石星光 沈力群

光明日报 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文库

党的理论 80 年历程

总主编 赵云献

主 编 马西林 石星光 沈力群

下

光明日报出版社

58. 本质与手段

《计划与市场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百废待兴，满目疮痍。国民经济领域各种矛盾积聚，经济依然徘徊。

要为“过气”的经济政策找出路。理论界“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激烈。

陈云的文章被许多人误解，认为他是主张计划的。事实是怎样呢？



《计划与市场问题》是陈云同志 1979 年 3 月 8 日写的提纲，是新的历史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一。这篇文章，从一个重要方面，剖析了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

全文包含六个部分：（1）有计划按比例是计划工作的规则；（2）1917 年后的苏联和 1949 年后的中国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办事的，缺少了市场调节这一条；（3）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经济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4）忽视了市场调节，就是忽视了价值规律、忽视了利润概念；（5）我国必须重视农业，坚持“农轻重”排列；（6）计划与市场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同时增加在经济中的比重。

原文赏析

计划与市场问题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

（一）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论点来之于马克思。

《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

《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二）一九一七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办事的。

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

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

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

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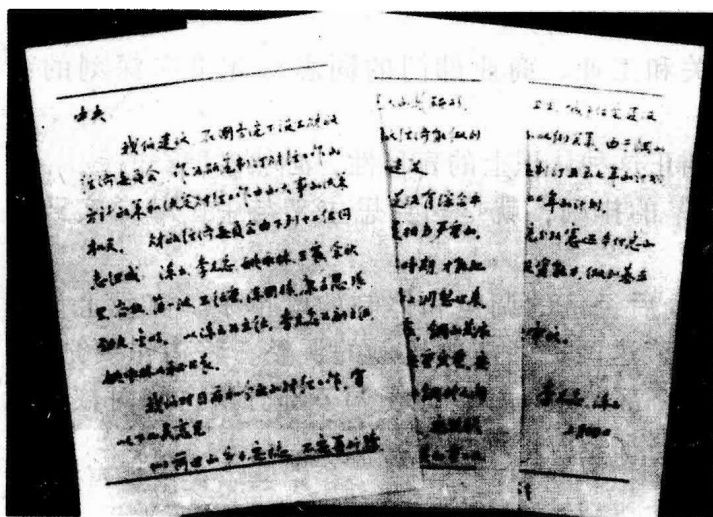
(三)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

(1) 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2) 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利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相当严重，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调整。

解放初期，只掌握了第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把一斤皮棉价定为八斤米价，结果棉花大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所以目前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

种现象。

该严的（必须按比例的不严，例如：

基本建设的战线太长；

电力、运输是必须先行的，非但不先行，反而落后；

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一般来说现在加工工业多于原料工业；

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

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

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

该宽的不宽，例如：

计划权力太集中；

农业的非计划部分现在还太紧、太死，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

地方财力用于建设太热心，因此地方财力真正机动的太少。

（四）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南斯拉夫受到苏联打击后，没有办法，只有大撒手，让市场经济部分大发展。看来那时计划部分太少，所以后来逐步增加了计划部分。

（五）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

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

“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六）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来龙去脉

(一) 市场机制的萌芽

1949—1978年，在国际、国内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下，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把马克思主义设想中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混为一谈，导致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商品、货币和市场交换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上是互相排斥的，而不是内生的、兼容的。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是无所不包的。资源配置、经济循环和利益协调等一切问题都可以由国家计划来解决。在这种思想导向下，我国在理论上奉行市场无用论和统一计划论，实践中建立了以轻视、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为主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该体制具有以下重大缺点和特点：以行政命令、行政手段和行政组织机构为中心；高度集中的宏观决策取代分散化的微观决策；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整个经济受行政力量的驱动，缺乏市场机制内在的组织功能。

1956年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在其后的几年间，理论界掀起了一次以“商品货币关系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为主题的讨论热潮。其间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文章，提出“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959年郑州会议后，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在实践中受挫而稍为收敛，理论界再次爆发如何认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的讨论。毛泽东提出过“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论断，号召全党学习和尊重价值规律。但这一思想受到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左”倾指导思想的极大局限，未能发扬光大。到“文革”前夕，中国的市场理论尚处在萌芽状态。

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理论界百花凋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压倒一切，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市场理论进入“难产”阶段。马、恩关于公有制建立以后，社会主义将不借助于市场机制的理论代替了中国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指导思想，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覆盖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市场机制的萌芽在夹缝中残喘。

(二) 市场经济可不可以姓“社”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众望所归地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鲜明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代性口号，给理论界注入了强大的活力。长期被斥为资本主义“黑货”的市场机制理论的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

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开始专门探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问题。会议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允许商品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逐步建立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十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由此，计划与市场主辅结合理论基本确立。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

邓小平在回答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费兰克·吉布尼、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教授的提问时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

在上午10日到11时半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吉布尼提问，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在中国社会主义缺席范围内，在继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的问题时进一步问道：你是否认为，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作用？

邓小平回答说：市场经济上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开始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给客人描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的情景。邓小平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是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是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现资本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还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它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使这个过程推迟了。

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以下意见：“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3月，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

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强调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当时的理论界普遍认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飞跃。”

真理总是在争论中产生和前进的。

1981年4月以后，报刊上有一系列文章对1979—1981年期间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批判。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则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重要体现”，“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有的人认为“有计划商品”的提法也不妥，因为这一提法的“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被抽掉了。”并认为，这类主张“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不相容的”，因为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把国营企业改变为完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确认“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就不是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而是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进行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有人还认为，按照“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的主张，“宏观很可能被架空，成为‘梁上君子’，”结果就会“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三）计划为主，市场为辅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在此，将“计划调节”改为“计划经济”，而理论的核心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这种计划与市场主辅结合理论在当时有其显著的进步处：第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认为，马克思计划经济理论是以高度社会化大生产、生产资料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和消除商品生产为前提的。而这种前提在我国尚不具备，因此不但需要计划经济，而且要求市场调节为补充。第二，承认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极作用，从而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不相容的传统理论。第三，为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条原则和突破口。

1982年，在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理论界有的同志认为，把所有企业都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观点，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人认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决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时只是少数派。

1982年7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报告还指出，为了使经济发展既是集中统一的，又是灵活多样的，在计划管理上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应正确划分指导性计划、指令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从而使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有了大的前进。第一，明确了在直接的计划范围内，也必须利用价值规律，同时开始注意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代替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市场调节，即认为市场调节部分也同样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第二，肯定提出了指导性计划形式的地位和作用，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直接等同于指令性计划的传统理论，为直接计划管理向

间接计划管理的转变提供了原则和依据。

(四) “商品经济不可逾越”

1984年9月，邓小平、陈云等同志批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9月9日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同意以下意见：“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首次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出，表明我们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有了认识上的突破。第一，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要求在改革中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克服计划体制过宽、过细的弊端；第二，强调指导性计划应成为计划的主要形式，要求在改革中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第三，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为核心。

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给予高度评价。他在通过《决定》的会议上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并且说，“这次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陈云同志也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一些做法，很多现在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50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

(五) 计划与市场可以统一

1985年10月23日，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企业家访华团。

当美方代表团团长格隆瓦尔德问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时，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一个好办法。但多年的经验证明，光用这个办法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样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描述。十三大的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并进一步阐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自觉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利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要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同时首次提出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

引导企业”的机制。

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论的提出，结束了长期以来理论上计划与市场“一方面”“另一方面”两张皮外在关系论和在实践中“计划一块”“市场一块”的二元格局。据此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一是重新构造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使企业从僵化的行政附属物转变为自主经营、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二是重新构造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系统，完成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三是大力发展和完善作为传导系统和经济运动载体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

1990年3月，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会议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1990年12月，针对理论战线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得要。不搞市场，自甘落后，世界信息都不知道。

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建议》指出：计划经济可以从总体上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资源合理配置，市场调节可以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计划管理必须自觉遵循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市场调节要在国家总体计划和法律约束下发挥作用；属于总量控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的调整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主要发挥计划的作用；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一般性技术改造和大型建设等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

讲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

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

1992年10月，十四大明确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变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十四大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应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历经十几年的曲曲折折，通过理论表层下的艰辛开拓，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终于确立。历史将永远记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在这漫长历程中的远见卓识和扎根当代中国现实，开拓科学社会主义新领域，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举和巨大勇气。

59. 立国之本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早在1978年9月，鉴于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出现的思想分歧，叶剑英就建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

当时有极少数人利用党拨乱反正的时机，歪曲“解放思想”的口号，散布怀疑、否定、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

“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正本清源、明确航向。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从1978年5月开始，全国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舆论准备。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三中全会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在1979年以后，开始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开始了繁重的经济建设工作，使我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当时，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值得可喜的一面。但同时在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了两种动向。一种是继续受“左”倾错误影响的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拨乱反正的时机，歪曲“解放思想”的口号，散布怀疑、否定、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在党内，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身错误的同时，出现思想动摇的倾向，有些人对这股否定党的社会主义的思潮认识不清，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支持。这种状况，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就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在中央宣传部于北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第一部分，形势和任务。邓小平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是：第一，基本上摧毁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二，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在此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思想政治方面，我们已基本上回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第三，国民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第四，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了很大的恢复，人们的积极性开始调动起来，等等。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困难。主要是，第一，经济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比例失调；第二，政治思想上还存在某些不安定的因素；第三，有些干部的思想还不够解放；第四，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在顽强地纠缠着我们。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第二部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

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只有从这两个特点出发，才能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子。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要从中国特点出发外，邓小平同志着重谈了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他说，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党内和社会上还存在着从“左”和右的方面歪曲、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邓小平在讲话中分别论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由。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有一些人散布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60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种重大曲折，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与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党而且引起全国人民的坚持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但是有极少数人不是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所要坚持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的旗帜。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有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允许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指出，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清是非界限，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第三部分，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邓小平指

出，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前我国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都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理论工作者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对四项基本原则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and 理论任务。邓小平还就几个比较迫切的理论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等等。邓小平还重申，要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特别是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邓小平这篇讲话，针对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当时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对于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前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现在，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我国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

原文赏析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同志们：

党的理论务虚会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向大家讲几点意见。

一 形势和任务

这次会议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认为揭批林